



中國史學史

◎ 白寿彝 主编

向燕南 张越 罗炳良 著

明清时期
(1840年前)

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

第 五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史學史



中国史学史

◎ 白寿彝 主编
向燕南 张越 罗炳良 著

第 五 卷

明清时期
(1840年前)

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史学史.第5卷,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白寿彝主编;向燕南,张越,罗炳良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072-X

I. 中... II. ①白...②向...③张...④罗...
III. 史学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4559 号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王小阳

中国史学史

(第五卷)

白寿彝 主编

明清时期(1840年前)·中国古代史学的嬗变

向燕南 张越 罗炳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6.25 插页 4 字数 423,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7-208-06072-X/K·1181

定价 45.00 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目 录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社会变化与史学特点	1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社会变化	1
一、封建社会的衰老	1
二、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	5
第二节 明清时期史学的特点	7
一、大规模官修史籍活动	7
二、历史批判与学术总结	13
三、走向社会的深层	19
四、史著的丰富、体裁的创新与理论的发展	24
五、域外史地撰述的格局与中西文化交流	31
第二章 明代的官修史书	37
第一节 明代官修史书及其特点	37
一、明代史官制度的变化	37
二、明代官修史书述略	43
三、明代官修史书的特点	50
第二节 《元史》的修纂	53
一、《元史》的修纂及价值	53
二、《元史》的缺陷及原因	56
第三节 《明实录》与《大明会典》	62
一、《明实录》的修纂及价值	62
二、《大明会典》的修纂及价值	66

第四节 明代方志的发展	69
一、方志编修的繁荣	69
二、方志编修的成就	73
第三章 明代私人撰史的成就	78
第一节 明代中后期私人历史撰述的蓬勃发展	78
一、明代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阶段	78
二、私人的本朝史撰述	81
三、《续文献通考》与《武备志》	88
四、《明经世文编》与《国榷》	97
第二节 王世贞、李贽和焦竑的史学	103
一、王世贞的本朝史撰述及史学批评理论	103
二、李贽的历史批判与史学批判	113
三、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成就	134
第三节 私人撰述的史论特点	146
一、历史评论中的文化新精神	146
二、对于历史的理性思考	152
第四章 明清之际的私人历史撰述与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164
第一节 顾炎武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	164
一、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治学特点	164
二、《日知录》的撰写及其史学价值	170
三、《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特点	177
第二节 黄宗羲的历史批判精神和学术史撰述	182
一、《明夷待访录》的历史批判精神	182
二、《明儒学案》的史学价值	189
三、《宋元学案》的撰述及史学成就	195
第三节 王夫之的史论成就	199
一、王夫之的历史思想成就	199
二、王夫之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212
第四节 顾祖禹和唐甄的史学	215

一、《读史方輿纪要》的特点和成就	215
二、《潜书》的历史批判意识	224
第五节 清初的其他几部私修史书	227
一、查继佐及其《罪惟录》	227
二、计六奇及其《明季南略》、《明季北略》	230
三、马骥及其《绎史》	231
第六节 历史思想的发展与嬗变	233
第五章 清代的官修史书	237
第一节 清代的官方修史与修史机构	237
一、官修史书的基本情况	237
二、修史机构的建制	239
第二节 《明史》的纂修及特点	243
一、《明史》的纂修	243
二、《明史》的特点	248
第三节 几种主要的官修史书	254
一、《清实录》的编纂	254
二、国史与会典	256
三、方略的纂修及价值	259
四、续“三通”和清“三通”	260
第四节 清代方志的编修与《大清一统志》	262
第六章 清代历史考证学的成就	266
第一节 赵翼和《廿二史劄记》	266
一、《廿二史劄记》的性质	266
二、赵翼的考史方法	269
第二节 钱大昕和《廿二史考异》	274
一、《廿二史考异》的考史特点	274
二、钱大昕的考史方法	280
第三节 王鸣盛和《十七史商榷》	285
一、《十七史商榷》的考史内容	285

二、王鸣盛的考史方法	291
第四节 崔述和《考信录》	296
一、《考信录》的考史旨趣	296
二、崔述的考史方法	301
第七章 清代史学的理论建树	307
第一节 历史考证学派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	307
一、关于历史进程动因的理论	307
二、关于历史变化法则的理论	312
三、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理论	318
四、关于历史评价的理论	324
第二节 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	333
一、关于史学性质的理论	333
二、关于史家素养的理论	343
三、关于史学功用的理论	352
四、关于历史编纂学的理论	356
第三节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中的史学批评及成就	372
一、史学批评的内容	372
二、史学批评的价值	382
第八章 清代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388
第一节 文献学家阮元的重大贡献	388
一、汇刻历史文献	388
二、提出文献校勘的理论和方法	392
三、推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397
第二节 清代史家整理历史文献的成绩	401
一、辑佚与补遗	401
二、考订与注疏	406
后 记	413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社会 变化与史学特点

本卷论述的是明清时期的史学,其断限是从公元 1368 年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省南京市)登极,正式建立明皇朝起,到公元 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五个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学逐渐发生嬗变的时期。历史上,一般是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历史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标志,但是从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一些旧的学术特点在此之后仍有延续,因此,为了撰述上的方便,本卷的有些内容,难免会涉及 1840 年以后。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出现较大变化的时期。这种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在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这时期的史学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六经皆史”的观点被更明确地提了出来,并逐渐被学者所认同。这些说明,所谓“六经”已开始出现失去原有对史学的绝对支配地位的势头。与此同时,在学术思想上不仅出现了针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批判思潮,出现了对于历史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获得了长足进步,对几千年的学术展开了颇具规模的、有成效的清理与总结,为新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此外,在史学的表现形式上,史学中的各类专史,较之以前也有了更突出的发展,甚至出现了短札形式的专题研究论集,出现了重考史、轻著史的苗头。这些发展的势头虽然十分缓慢,却又都是无可挽回的,透露出中国古代史学悄然嬗变的消息。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社会变化

一、封建社会的衰老

如何认识明清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历

史的表象看,无论是以汉族统治者取代蒙古族统治者统治而建立的明皇朝,还是以满族少数民族统治者为统治核心而建立的清皇朝,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统一多民族的封建皇朝,都保持着有效的统治能力。在这个时期,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又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边疆地区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规模。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官僚行政制度也进一步缜密,封建国家的统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社会经济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在明清两个皇朝的前期,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之后,由于一些社会矛盾曾得到较好的处理,都一度出现了历史上的盛世:明皇朝有所谓的“仁、宣之治”,清皇朝则有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它们也是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盛世之一。但是与此同时,从整个社会形态发展的进程来看,明清皇朝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尤其是与同时代正值发展中的西方资本主义横向比较,明清时期貌似太平的辉煌,实则却是正在走向衰世的凄凉。衰老却未至解体,生命力虽不再旺盛却依然顽强,这就是明清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衰老的症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君主专制政治空前发展,一是商品经济长足发展,并在一些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促生出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其中,前者是旧的政治体制的极端发挥,后者是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滋生,二者之间矛盾冲突的展开,不仅标志着中国的封建社会向其末期转化,步入它的衰老时期,而且也规定了这时期的社会新与旧、衰老与新生、压抑与反抗的总的矛盾运动。正是从明清时期开始,中国古代社会开始顺着其自身发展的惯性,逐渐向新的、近代的社会形态迈进,并在政治机制、经济结构、社会因素以及文化观念等多方面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而明清的统治阶级则借助国家机器极力阻碍这些新生力量的发展,企图延续这个旧制度的生命。历史的转折,决定了明清时期社会矛盾运动的复杂与剧烈。

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集权制逐步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封建关系逐步削弱的过程,是封建生产关系的生命力逐渐衰退的过程”^①。历史上,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这时期,在中央,统治者开始废除了自秦汉以来施行了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废除了自隋唐以来施行了七百余年的三省制度,将君权与相权合而为

^① 《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一；在地方，构筑行政、军事、监察相互制约的体制，进一步完善地方保甲等制度，形成了君主垂直控制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政治格局。同时，为了保证绝对君主专制政治的实施，保证强化的“家天下”式的国家机器运转，明清两朝的统治者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气力制定新的法典及礼典，进一步以礼入法，将儒家的纲常名教更紧密地融入法典之中，在完成神权、君权、族权、夫权法典化的同时，也以法的形式更突出了君权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和对反抗力量的镇压。例如《大明律》规定：“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①又规定：“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②从法律上将君主的独裁专制权力固定下来，使各级官吏无条件地效忠君主个人，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又如以往的《唐律》规定，对于有涉“谋反”、“谋大逆”者，惟首犯处斩刑，其父及年在十六岁以上的儿子处绞刑，其余亲属则不处以死刑。但是《大明律》的规定，则是不分主、从犯一律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者，年十六以上者，一律处斩刑^③，极大地加大了镇压的力度和严酷性。此外，明太祖还令人汇集各种官民犯罪事例编为《大诰》，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观为戒”。并下“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幼知所遵守。阅三岁，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视其所诵多寡次第赏之”^④。清承明制，又进一步在明代律典的基础上，深文周纳，集历代刑法之大成，不仅“谋反”、“谋大逆”、“不义”等所谓“十恶”一律处以极刑，还规定对人民的集会结社、聚众罢市、喧闹公堂、编写或歌唱违禁词曲歌谣，以及一切有碍于封建统治的言论和行动，都要予以严厉的处罚。同时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严厉施行保甲制度及其连坐法，通过法典将社会上下织成一张密密匝匝的控制之网。

通过建构极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明清时期的封建国家集权政治虽然得到大大的强化，但是它的反动性也愈加突出，生命力也愈加削弱。明代晚期的政治已是十分腐败，至清代则完全依赖军事力量进行统治，不仅设立军机处，在皇帝的直接掌控下总揽全国军政大权，使内阁徒拥虚名，六部的职权进一步

① 《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上言大臣德政》。

② 《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大臣专擅选用》。

③ 参见《明律集解附例》卷一八《谋反大逆》及卷一一《禁止师巫邪术》。

④ 见《大诰·颁行大诰第四十七》及《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一月癸巳”。

削弱,而且在京设立兵民合一管理的组织“八旗”都统衙门分管各旗事务,京师之外设立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与驻扎大臣,分管各地驻防旗兵事务,使军事控制深入至基层。其时,虽然维持了封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一度抵御了殖民主义者的入侵,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落后,最终仍在西方资本主义东来的势力面前不堪一击,遭到鸦片战争的失败^①。

但是,与明清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空前强化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以及因这些突出发展而带来的新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等社会因素的变化。

明清时期新的社会经济变化相当突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其至少包括:(1) 国税与地租逐渐分离,开始向单纯财产税的形式过渡;(2) 劳动者对于封建国家及地主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削弱,劳动力的性质发生了相对变化,并开始导致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出现;(3) 农业生产中的商业性农业大规模发展,原以单一粮食生产为主,自给自足性质的经营格局逐渐被突破,农民开始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市场活动之中;(4) 民营手工业突出发展,逐渐取代专为满足皇室及各级政府消费的官营手工业,而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主要力量;(5) 地区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增高,社会商品交换活跃,商业性城镇大量涌现,在围绕商业性城镇形成不同经济区域的同时,全国的市场联系也越来越紧密;(6) 社会货币体系发生变化,货币流通量在大致恒定的人口数量下急剧增加,具有更高价值的白银,逐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等等。

在新的经济变化的影响下,明清的一些社会结构也开始出现了新变化。其中诸如:(1) 政治身份削弱、剥削贪污能量增加的官绅地主,取代了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而成为地主阶级的主要力量;(2) 包括各种商人、各种城镇劳动者及各色无业游民的市民阶层迅速成长,商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3) 社会性教育得到大大普及,地方社团组织出现发育的迹象,地方社区的功能也有所扩大,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在逐渐弱化等等,这些均与社会经济的变化一起,诱使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其中,诸如对于“公”乃至“天下”观念的强调,对于封建政治专制及文化专制的公然否定甚至

^① 参见白寿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之“第三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复辟和反复辟的问题”,载《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2页。

批判,对于人的合理欲望及其追求的肯定,以及实学思想的突出发展等等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潮开始涌现,一一走上历史舞台,在原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条件下相对平静的封建社会中不断搅起波澜,呼唤着社会向着近代社会逐步转型。

二、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

正当中国的封建社会缓慢地走向衰老之时,西方的殖民势力则开始逐渐东来。中国在对外问题上开始经受了历史上空前严峻的考验。

明清时期的历史,也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西欧国家处于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的时代。在不同社会发展趋势的较量中,中国的对外关系在这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由主动变为被动。明初以来,倭寇在沿海各地的侵扰,达两个世纪之久。明清之际,沙皇俄国开始侵占中国疆土,以致后来在雅克萨挑起了两国间的战争。这在以前的中外关系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发现东方新航路之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于1513年始,首先到中国来与中国发生关系,此后至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步葡萄牙人之后,先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再后有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陆续不断地向着中国涌来,企图叩开中国的大门。这些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商品、炮舰来打开中国的大门,对中国进行野蛮的掠夺,先后强占了中国的澳门、台湾等地,并且越来越猖狂地侵扰华南、华东等沿海地区。

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者殖民侵略及商业活动而来的,是西方天主教会“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①。从1579年起,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不断随西方商船到中国,展开积极的传教活动。明末清初,他们在中国的十三省设立了天主教堂。1610年,中国人信教者有二千五百人,1617年增加到一万三千人,1636年增加到三万八千二百人,1650年增加到十五万人。明朝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宫中的太监如庞天寿、若瑟,都信奉了天主教。南明小朝廷永历帝及其皇后、太后和太子,也都入了教。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势头,经过明

^① 利玛窦语。参见顾裕禄:《对利玛窦传入欧洲科学的剖析》,《光明日报》1983年7月20日史学版。

朝晚期的盛期以后,在清代有所减弱。清初曾任用一些西方传教士做官,但只是在技术上使用,对于天主教的传播是加以限制的。康熙皇帝曾下令禁止传教士设教堂和进行传教活动。但罗马教皇不顾中国的禁令,指示中国教徒不得祭天、祭祖、祭孔,并派使臣于1720年到达北京,求见康熙皇帝,要求由他管理在中国的传教士并按照教廷的规定来接受中国教徒。由于罗马教皇的这些活动有损于中国的主权,也就必然地遭到了康熙皇帝的拒绝,并令大臣传谕罗马教廷的使臣曰:“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此后,清廷对传教之禁,有时紧,有时松。总的说来,天主教的传播虽不如晚明之盛,但始终没有停止。

当西方天主教的耶稣会士积极开展向中国的传教活动之时,沙皇俄国的东正教也在开始他们的传教活动。东正教于1732年被允许在中国建立教堂。后来又被允许教士每十年换班一次,届期可以自由回国。沙俄正是以教会作掩护,开始在中国建立起阴谋活动的据点。鸦片战争以前,东正教教士共换班十一次,每班真正的教职人员很少,多数都是披着宗教外衣来中国调查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他们还绘制了中国一些地方的详细地图带回本国,充当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有力工具。

与新兴西方殖民主义者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明到清对外政策的逐渐保守与退缩。明朝初年,统治者对外政策的表现,一方面急于在传统朝贡的模式下,以皇朝为中心,建立起其海外政治外交、经济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的对外关系,并于永乐时期使郑和完成了“七下西洋”,“宣德化、柔远人”的壮举,把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朝贡贸易推到了极盛;另一方面又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极力限制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从明太祖屡屡谕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①,到明成祖明确宣布,“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并“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等^②,都体现了对内严格海禁的政策。这实质上也是当时强化的封建君主集权政治意志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但是几经周折,在国内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私人海外贸易活动日益活跃的情况下,于中后期以后,明廷才开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逐渐调整了早已不现实的朝贡海外贸易体制,逐

① 见《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条及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己巳”条。

② 见《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上“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条及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辛酉”条。

步开放了对私人商贸的海禁，“准贩东西二洋”^①。这种对外政策的变化，一度对于明末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种开放性的对外政策，随着崛起于东北内陆的满族所建立的清政权在全国政治统治的确立而骤然中断，代之以全面的、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甚至发展为迁海政策。先后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四年(1665年)、十一年(1672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禁海令；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发布迁海令，多次发布相关法令。“当是时，诸臣奉命迁海者，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凡三迁而界始定。坠县卫城郭以数十计，居民限日迁入，逾期者以军法从事，尽燔庐舍，民间积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乃著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其失于觉察者，坐罪有差。功令既严，奉行恐后，于是四省滨海之民，老弱转死于沟壑，少壮流离于四方者，不知几亿万人矣。”^②就这样，当西方加紧海外扩张，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加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促使新的生产力巨大发展之时，中国的统治者却逆历史潮流而动，闭关自守，拘囿于旧的自然经济范围内，将自己摒于世界的发展之外，致使中国离世界的发展越来越远。虽然在开始一度抵御住了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但是最终还是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下被迫打开大门，导致落后挨打的悲剧发生。

西方殖民势力的逐渐东进，是以往中国前所未遇的时代问题，而明清统治者采取的逐渐退缩、保守的对外政策，则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如何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新的时代问题，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包括史学在内的文化发展等等，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明清时期史学的特点

一、大规模官修史籍活动

明清时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修史活动频繁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② 王胜时：《漫游纪略》卷三《粤游》。

进行,编纂了大量卷帙浩大的历史著作。明清时期的这种史学特点,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从积极意义的层面讲,它推动了文化建设。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既是在明清时期长期统一与稳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下,封建国家社会职能得以有效发挥的结果,也是封建国家的官僚体系高度成熟、缜密在史学中的反映。从消极意义的层面讲,它也抑制了文化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因为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封建专制制度空前强化在文化方面的体现。鉴于明清时期大规模官修史书这种复杂情况,我们就有必要结合这时期政治和文化的事实,客观辩证地评价它的史学价值与局限。

与所谓“盛世修书”的基本规律相一致,明清两代的官修史籍活动,主要开展于各自最具生命活力的初期或前期。其中明代,据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统计,在有明一代所敕撰的二百余种图籍中,成于洪武朝的有八十四种,成于永乐朝的有三十三种。二者相加达一百一十七种,超过了整个明代敕撰图籍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相当多的图籍是史著^①。清代大规模官修图籍的活动较之明代更为突出,但是与明代的情况相类,敕撰图籍最集中的,也是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其中,不计《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韵府拾遗》、《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及《朱子全书》、《性理大全》、《性理精义》等儒家类著作和《春秋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等经部著作,清代最重要的一些官修史籍,如《续三通》、《清三通》、《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大清律例》、《八旗通志》、《赋役全书》、《孚惠全书》、《吏部则例》、《户部则例》、《工部则例》、《礼部则例》、《物料价值则例》、《督捕则例》、《八旗则例》、《军需则例》、《中枢政考》、《学政全书》、《钦定训饬州县规条》、《户部漕运全书》、《大清通礼》、《皇朝礼仪图式》、《国子监志》、《词林典故》、《康济录》、《国朝宫史》、《皇清奏议》、《皇清开国方略》、《平定三逆方略》、《平定罗刹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等等,无不或成书于这三朝,或肇修于这三朝。

显然,明清官修史籍主要集中于皇朝的初期、前期,除了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相对发展,以致皇朝能够在充沛财力、人力支持的情况下,相对更加有效地发挥国家的社会职能,组织图籍编纂的原因外,更为现实的原因是,皇朝建立的初期、前期,也往往是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亟待建立各种制度及

^① 参见《明代敕撰书考》及顾颉刚《序》,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版。